

《人民日報》對新冠疫情報道的框架分析——正當性的視角

發表人：林鈺穎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生

中文摘要

框架理論認為，媒體的報道會通過對現實內容的選擇影響讀者對事件的認識。而在風險事件發生後，媒體會如何報道和論述這一風險以及風險所帶來的危害成為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文以新冠疫情為例，研究《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自 1 月 21 日宣佈病毒可人傳人至 4 月 8 日武漢解禁期間的媒體論述框架為何，並從政治學中正當性(legitimacy)的角度切入，對框架內容進行分析。本研究通過對 297 篇新冠相關文章的分析與歸類，總結出九種風險論述的框架。

關鍵詞：正當性 框架分析 風險論述 新冠疫情

壹、緒論

2020 年 1 月 21 日，中國官方宣佈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正在武漢傳播，1 月 23 日，武漢市被封鎖。然而，這一封鎖行動並未來得及阻止病毒擴散至全國甚至世界其他地區。而事實上，早在武漢封城的 25 天前，中國的醫生就已經拉響了警報（儲百亮，2020c）。12 月 30 日，武漢醫生遇到了類似由 SARS 病毒造成的肺炎患者，並將此報告流傳到了微信上。隨後，中國國家衛健委的醫學專家趕赴武漢研究這些病例，發現了一種與 SARS 基因序列大致相似的新型冠狀病毒。然而武漢和北京的官員卻選擇隱瞞這一不尋常肺炎的嚴重性和傳染性，並將警告大眾 SARS 可能捲土重來的八名醫生斥責為造謠者，其中就有後來為人熟知的李文亮。

新冠肺炎爆發後，民眾在互聯網上對官方遲緩的疫情應對和早期的隱瞞行為表示憤怒，不少民眾對官方媒體的公信力產生了懷疑並公開批評官媒鼓吹個人犧牲卻無視醫生人權的報道（袁莉，2020），這讓中共的執政正當性遭到了幾十年來最大的挑戰。與此同時，新冠肺炎傳播至全球，引發了世界各地的指責，美國總統川普甚至以中國病毒來指責北京。但是就在幾個月後，中共控制住了疫情並成功重寫其政治敘事，「習近平把自己塑造為一名不可或缺的領導人，在難以對付的威脅面前，站在城牆上保衛中國」（儲百亮，2020a）。尤其在美國糟糕的疫情管控的對比之下，中國民眾的愛國主義情緒和民族自豪感被激發起來，退役大校王湘穗表示，「在這次抗疫鬥爭中，也會有勝疫國和敗疫國，我們是勝疫國，而美國現在還在那個泥坑裡面出不來，我覺得它很可能變成一個敗疫國」（儲百亮，2020b）。

在此期間，中共被指責通過壓制負面新聞和無視自己早期錯誤的方式來塑造共產黨的勝利敘事（郝海威，2020）。可是，他們又是如何重塑了民眾關於新冠疫情的集體記憶，並重新獲得民眾的支持和認可的？他們為何能在重大的健康風險事件中進一步增強民眾的凝聚力和愛國主義情懷呢？Bondes 和 Heep（2013）認為政治領導人常常通過官方框架對其認為的正當性缺陷作出反應，以平息民眾的不滿。通過在官方框架中注入黨的意識形態，當局加強了民眾對統治者領導能力的信心和其正為集體的共同利益服務的信念。Brady（2009）在梳理中共從 1989 到 2007 年的官方文件時發現其吸納了西方的公共關係學、大眾傳播學和社會心理學等說服理論來幫助宣傳黨的意識形態，通過規定在公共場合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來建立一個框架並控制訊息。Holbig（2011）的研究也發現，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中，中共通過將國內成功應對危機的表現與有關危機在世界其他地區造成

嚴重影響的報道拿來比較，成功地把危機轉化成一個獲得群眾支持和達到政治目的的機會。

這些研究表明，在風險事件發生後，中國官方會通過某種說服框架來向公眾進行政治正當性的維護，進而重新獲得民眾的信任和支持。同時也說明，正當性和框架理論能夠為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的媒體論述提供一個較為有力的解釋。不過，目前尚未發現有相關的研究提出中國政府在風險事件中進行正當性維護的具體論述框架，以及與這些框架相對應的社會情形與條件。因此本文以新冠疫情為例，並以 3 月 11 日 WHO 宣佈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為分界點，研究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自 1 月 21 日宣佈病毒可人傳人到 3 月 11 日期間與 3 月 11 日之後至 4 月 8 日武漢解禁期間的媒體論述框架為何，以及兩個時間段的論述框架之間的異同。本研究認為，在新冠病毒蔓延武漢封城初期，媒介的話語集中在維護社會的穩定與宣揚政府有戰勝疫情的能力；及至疫情蔓延全球，中國成為眾矢之的，媒介的話語開始轉向呈現中國對世界各國控制疫情的貢獻並通過強調他國疫情的嚴重性來凸顯自我政策及政權的優越性。

貳、文獻回顧

一、正當性在中國的發展

正當性 (legitimacy) 一詞源自西方，在當今的討論中涵蓋了對國家權力來源的各種不同面向，包括法理性的和非理性的 (趙鼎新，2018)。換句話說，正當性是為了回答「統治者為何能統治被統治者」的問題，它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前形成一個不成文的契約，使得統治者擁有領導的權力而被統治者必須聽從統治者的指揮和安排。因此正當性一旦被打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契約就宣告終結，統治者的地位會受到威脅甚至被推翻。因而對一個政權來說，維護其統治的正當性對政權的穩定和延續至關重要。西方對於正當性理論的探討已經多達半個世紀之久，而直到 2004 年正當性才正式在中國被討論和提及。

自蘇聯解體和東歐柏林牆倒塌之後，西方對於中國這一仍然存在的威權主義政體的正當性並不持正面的看法。而中國在經歷八九事件之後，也開始對黨國的政治正當性產生了擔憂，鄧小平把對群眾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失敗看作他改革「最大的失誤」，並在此之後通過加強對社會大眾的政治教育工作，來抵制自由民主等西方思想的和平演變 (曾敬涵，2016)。2004 年 9 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若干意見》，指出黨的執政地位不是天生的，

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由此打開了討論黨的正當性的大門(Holbig, 2011)。2015 年，時任中共中央紀委書記的王岐山在會議上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辦好中國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李衛紅、姜潔，2015)。

與此同時，由於缺乏民主選舉的程序正當性，加之改革開放後中國採用市場經濟的經濟政策，被認為是向資本主義社會拋出的橄欖枝以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瓦解(趙鼎新，2016)，因而西方學者普遍認為中共不具有穩定的正當性基礎。但面對中國的高速發展和不減反增的民眾支持度，西方學者開始重新討論中共正當性的來源。有學者從績效正當性的角度談論中共的政權，認為通過保持以經濟增長為主的政府功績，中共在大眾間獲得了較高的支持度，但這樣的支持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因為一旦中共無法完成許諾的經濟指標，民眾就會對政府失望(趙鼎新，2016)。通過梳理英文文獻中對中國政治正當性的研究，曾敬涵(2016)總結出四個西方學者討論中共正當性的途徑，分別為績效正當性、文化歷史傳統、民族主義和制度變遷，其中績效正當性還包含了經濟表現、社會穩定、提供社會福利、危機管理和道德功績這五個內容。而反觀中國學者在 2008-2012 年對正當性的討論則主要集中在解決由社會經濟不平等、腐敗和低效的官僚系統造成的正當性威脅，並針對這些問題提出增強意識形態教育、維持社會公正和提高政府管治能力的政策建議(曾敬涵，2016)。

總的來說，中國政府的正當性基礎已經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通過維持正當性的努力，中共持續受到民眾的支持和信任。不過，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這些正當性基礎是如何與黨的意識形態相互聯繫的，政府又是如何通過媒體的論述來說服民眾和維護正當性的呢？

二、正當性與意識形態

趙鼎新認為(2018)對績效正當性的重視，難免會削弱其他類型正當性如意識形態正當性和程序正當性的地位。而曾敬涵(2016)則指出，這一觀點的瑕疵在於把意識形態看作是一種信仰而非政治論述。這二者的區別在於，當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政治論述時，即便黨員幹部並不信奉這些意識形態，但他們的言行還是會受到相應的制約(曾敬涵，2016，頁 110)。不同信仰的人可以擁護同一種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力量不只源於信仰，也來源於人們對它的尊重(Schull, 1992)。因此，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並沒有因為共產主義信仰的降低而消失。另一方面，

意識形態在影響其它正當性來源時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於危機對政治正當性的影響來自民眾對危機和政權的看法，因而政府如何用意識形態去塑造人民對危機的看法，是決定危機對正當性影響的關鍵（Gilley & Holbig, 2010）。從績效正當性的角度來看，政府績效產生的正當性不是由績效本身直接轉換的，而是來自公民對政府績效的主觀感知，而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大眾對績效的主觀認知（曾敬涵，2016，頁 11）。此外，曾敬涵還將意識形態分為正式意識形態和非正式意識形態。其中正式意識形態如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中國夢是面向黨員內部，用以維持共產黨內部凝聚力的論述，而非正式意識形態則是面向大眾的用以獲得外部正當性的政治論述。由此看來，意識形態的宣傳與政府的正當性來源相互滲透難以分割，因而本研究將從曾敬涵（2016）提出的四種面向大眾的非正式意識形態來梳理和整合中國的政治正當性來源。

（一）、穩定論

隨著對社會經濟不平等的焦慮，中共一方面用推行科學發展觀來逐漸把增長模式從效率優先轉向為效率公平兼顧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國把傳統儒家思想的和諧重新翻新成社會主義版本的和諧，主要目的就是在社會衝突加劇的環境下，提倡大家自覺來維護現有的社會秩序，進而隱晦地呼籲社會更多地包容當下的各種社會問題（曾敬涵，2016）。與此同時，中共還常通過描繪西方社會的混亂和民主運動造成的不穩定來強調社會和諧的重要性。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為中共在新冠疫情早期的隱瞞行為和遲緩應對提供了解釋和被原諒的空間。關於新冠疫情的報道屬於災難和風險報道，這是中國的黑區禁忌新聞，因中共認為風險報道若不加以控制，將會引起社會恐慌、人民不滿和社會動蕩（趙鼎新，2018），正式如此，有時為了政治考量，中共會選擇封鎖風險和災難相關的訊息。

意識形態借鑒傳統文化的例子還包括了「德治」和「仁政」概念的提出，旨在傳達統治者品行端正，不貪污腐敗，且為人民利益考量的觀點。這一觀點對應了官方媒體把習近平塑造成領導中國走向勝利的偉大領袖的敘事。值得一提的是，實證研究表明中國中政府的群眾支持度較高，而地方政府的支持度卻相對較低（Cai, 2008）。針對這一現象，Tong(2011)認為，

中國以道德為基礎的政權正當性必須在這種多層次的權力結構中進行校準。總體而言，各級政府的正當性程度不同，面臨的挑戰也不同。與地方政府相比，

中央政府享有最多的正當性，面臨的挑戰也最少。最高領導人出現在電視新聞或視察中，能夠保持良好的道德形象，滿足正當性的道德和仁慈部分。對人民福祉的責任首先體現在地方一級。只有當地方政府失敗時，中央政府才會介入。而中央政府作為救世主的職能進一步鞏固了其正當性。

換句話說，這種多層次的權力結構進一步鞏固了中國社會的穩定。在風險發生的時候，民眾將矛頭指向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疫情期間，中共通過對武漢官員的罷免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民眾的憤怒，並向公眾傳達出中央給出了正確的指示，但地方政府沒有妥善執行的觀點。這些意識形態進一步維護了社會穩定。

（二）、國情論與中國特殊論

中共的另一個非正式意識形態為國情論，這一論點與中國特殊論相輔相成。國情論包含兩個方面，包括中國特殊性和發展階段。這兩個方面意在說明，擁有著幾千年歷史文化傳統的中國不適合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是應當發展出擁有自己國家特色的社會制度。而發展階段則指出了，從中國當前的社會發展狀況來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比民主自由更加重要（曾敬涵，2016，頁 121）。而中國特殊論則承襲了國情論中的特殊性觀點，認為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決定了中國應該有自己的政治體制，而不是學習西方。正如習近平指出，「宣傳闡釋中國特色，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倪光輝，2013）。

此外，為了加強意識形態的建設，中共還大力遏制宣揚西方自由民主精神的內容，加大了對網路中的民眾言論的審查(King, et al., 2013)，並認為公共知識分子對政府的激烈批評是試圖推翻中共的領導，是造成社會負能量和不穩定的源頭（石平，2013）。時任中國政法委秘書長的周本順（2011）提出政府不應該提倡用公民社會管理社會，因為公民社會是西方國家設計的陷阱。這些言論管制的結果是，超過 93%的中國受訪者認為雖然當前的政治體制有一些問題，但仍然是最符合中國國情的（Wang, 2010）。

（三）、國家復興論和高漲的愛國主義

國家復興論宣揚當前中國採取的一黨制是為了讓中國恢復到以前的主導地位。這一意識形象想要向群眾強調，中國的復興並不只是集體的民族驕傲，同時也與個體福祉息息相關。中共一直致力於把強國和富民聯繫在一起，這說明一個

富強的國家也會讓人民受益（王星閏，2010）。

由此出發，國家復興論就與績效正當性聯繫在了一起，為的是突出政府正帶領民眾走向民族的復興。為此，中共則格外強調在經濟表現、社會穩定、提供社會福利、危機管理和道德功績上的成就。社會契約理論就認為，共產主義政權提供物質福利來換取對公民權利的嚴格控制（Kusin，1978）。正如官方媒體在疫情期間宣傳對新冠患者採取免費治療的措施、在一星期內建成方艙醫院以及為海外留學生提供健康包等公共福利上的努力，就是為了維持其績效正當性。另一方面，中共還通過其管控和化解危機的能力和對當前體制的修繕來鞏固它的執政地位（Xiao, 2013）。在道德功績上，主要是通過反腐等措施來提升官員的道德性。不過在這一方面，中共更注重內部制衡，即通過黨內部的紀律委員會反腐，而不是引入外部民主監督（曾敬涵，2016）。此外，中共還格外強調領導人「親民」的形象來展現執政者的道德。

復興論的另一個部分，則是通過把中國的富強塑造成西方的敵人來團結國內社會。中共認為中國的崛起挑戰了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是西方霸權的代名詞，所以中國模式變成了西方的威脅（王義桅，2013）。同時，為了塑造中共統治下欣欣向榮的盛況，官方敘事常常把經濟的成功與民族自豪感聯繫在一起（Cong，2013），並與其他民主國家的經濟困境作對比，從而傳遞當前的政治體制比其他任何制度（尤其是民主）更能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的觀念。在這樣的比較之下常常會掀起民眾心中的愛國主義情懷，而這一情懷常被認為是一把雙刃劍，因為它一方面可以提供正當性和提高政治動員能力（張文靜、杜軍，2010），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得民眾要求官方在外交態度上更加強硬，否則則會引起民眾的不滿。但從目前來看，中共的四個非正式意識形態順利地在新冠疫情的危機中維護了中共的正當性。因此，本研究將以這四個非正式意識形態為理論基礎，檢視官方媒體在疫情期間的論述框架。

叁、研究方法

《人民日報》乃是中國中央級別的共產黨機關報，被稱為「黨的喉舌」，用以向中共內部和社會大眾傳遞官方的意識形態觀點和政策。自社群媒體發展以來，中共開始採取「兩微一端」的宣傳政策，亦即使用微博、微信和客戶端三個渠道同時向大眾發送訊息。而原先紙本的《人民日報》則主要用以向黨員內容傳遞資訊。因而要想研究中共官方如何向大眾傳遞非正式意識形態，社群媒體上的新聞

是為最好的研究對象。故本文將以新冠疫情為例，並以 3 月 11 日 WHO 宣佈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為分界點，研究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的微信公眾號自 1 月 21 日宣佈病毒可人傳人到 3 月 11 日期間與 3 月 11 日至 4 月 8 日武漢解禁期間的媒體論述，以及這兩個時間段的論述之間的異同，由此歸納和預測中共在面對風險事件時的將會採取的論述框架。

通過整理得出，《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在 1 月 21 日至 4 月 8 日期間總共發佈文章 1377 條，其中與新冠疫情相關的新聞為 1291 條。為進一步分析這些文章，本研究通過間隔抽樣的方式，在 1 月 21 日至 3 月 10 日的 50 天內以每個五天抽樣一天的方式，共獲得 10 天 162 篇文章；而 3 月 11 日至 4 月 8 日的 39 天內，每隔 3 天抽取一天，共獲得 9 天 135 篇文章。本研究對這 297 篇文章進行編碼，編碼主要涉及一下幾個問題：

- 1、文章的內容為何？
- 2、文章內容屬於哪種框架的敘事？
- 3、文章內容指向的是哪種非正式意識形態？

肆、研究分析

通過對這 297 篇媒體報道的分析，本研究共總結出九種風險論述的框架，分別為國內風險時況匯報、集體精神與和諧社會、科普與闢謠、國家能力與效率、違規批評與處罰、國家領導人的指示與事跡、風險在國外蔓延、國外媒體抹黑中國、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其中集體精神與和諧社會、科普與闢謠、違規批評與處罰以及領導人指示與事跡主要傳達穩定論的非正式意識形態；而國內風險時況匯報、國家能力與效率、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則傳達復興論的意識形態；風險在國外蔓延和外國媒體抹黑中國屬於國情論與特殊論的意識形態。研究發現，不論是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前後，《人民日報》發佈最多的媒體內容均為國內風險時況匯報和集體精神與和諧社會，可見其在風險事件中相當注重維護社會的穩定以及宣揚國家復興富強的意識形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全球大流行之後，報道風險在國外蔓延、中共對世界的貢獻以及國外媒體抹黑中國的文章分別從全球大流行前的 3.1%、1.2%和 1.9%上升到了 14.1%、11.9%和 3.7%，這一媒介論述的調整幫助中共迴避了世界各國的指責，同時重新樹立大國形象，獲得公眾的支持與信任（見表 1）。本文將從三個非正式意識形態的角度逐一分析每一個框架。

表 1：《人民日報》風險論述框架與意識形態分析

日期 排名	3 月 11 日前	3 月 11 日後
	框架/ 數目 (百分比) /意識形態	框架/ 數目 (百分比) /意識形態
1	國內風險時況匯報 / 43 (26.5%) /復興論	國內風險時況匯報 / 40 (29.6%) /復興論
2	集體精神與和諧社會 / 35 (21.6%) /穩定論	集體精神與和諧社會 / 36 (26.7%) /穩定論
3	科普與闢謠 / 35 (21.6%) /穩定論	風險在國外蔓延 / 19 (14.1%) /國情論
4	國家能力與效率 / 21 (13%) /復興論	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 16 (11.9%) /復興論
5	違規批評與處罰 / 11 (6.8%) /穩定論	國家能力與效率 / 13 (9.6%) /復興論
6	領導人指示與事跡 / 7 (4.3%) /穩定論	外國媒體抹黑中國 / 5 (3.7%) /國情論
7	風險在國外蔓延 / 5 (3.1%) /國情論	違規批評與處罰 / 3 (2.2%) /穩定論
8	外國媒體抹黑中國 / 3 (1.9%) /國情論	科普與闢謠 / 2 (1.5%) /穩定論
9	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 2 (1.2%) /復興論	領導人指示與事跡 / 1 (0.7%) /穩定論

一、穩定論

在穩定論的意識形態下，共有集體精神與和諧社會、科普與闢謠、違規批評與處罰和國家領導人的指示與事跡四種論述框架。新冠疫情在國內爆發初期，由於官方和民眾都對這一陌生的病毒知之甚少，又因病毒的基因序列與 SARS 病毒極為相似，因而在民間喚起了被稱為 SARS 捲土重來的集體恐慌。為了避免由恐慌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以及維持社會的穩定，中共官方在向公眾介紹和傳達不明肺炎時，有意地弱化了其危害性。2019 年 12 月 30 日，武漢市衛健委發佈的《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敲響了新冠肺炎的第一個警鐘，然而此時的通知並未提高官方和公眾的警惕，而是被官方媒體有意通過「未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和「不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等論述減弱了公眾的關注，而同時也造成了早期抗擊病毒的鬆懈（馬曉華，2020）。因而一直到 1 月 20 日醫學專家鍾南山在官方媒體首度確認病毒可以「人傳人」之時，已經有 14 名醫護人員感染，136 例武漢當地確診病例以及擴散到北京和深圳的三例武漢以外地區的病例。疫情的嚴重性讓中共官方備受指責，面對「應對遲緩」、「封鎖訊息」等責難，中共必須採取措施來重塑官方的權威和民眾的信任。

（一）、集體精神與和諧社會

在本文分析的 297 篇文章中，屬於這一框架的文章共有 71 篇，在 3 月 11 日前後分別佔各階段的 21.6%和 26.7%。3 月 11 日前，官方媒體在這一框架中刻畫了許多為集體利益而奉獻自我的個人英雄形象，包括醫護人員、口罩生產商、酒店保潔、志願者等等。例如，在一篇名為<這張對比照，令人淚目！>的文章中，呈現一名女醫生支援武漢前後的照片。其中一張照片展示了這名女醫生在出發去武漢前抿著嘴巴為提高免疫力而接受施打胸腺肽的畫面，畫面中的她堅強而美麗；而另一張照片則是其支援武漢七天後的臉部特寫，原本美麗光滑的臉上滿是因長期佩戴口罩而勒出的印痕，在這兩張圖片下配有文字「向奮戰在抗疫一線的醫務人員致敬！」。此外，這一框架中還刻畫了自行去醫院給醫護人員遞送感謝信和捐款的小男孩形象、為了抗疫的便利而剪去長髮的女護士形象、在抗疫過程中染病，殉職前還心繫他人的醫生、自發為醫生收集和傳送醫療物資的志願者、為向醫院供應口罩一個人加班加點扛起生產線的工人等等。

這種為個體加冕的論述能夠在社會衝突和危機場景下凝結出社會共享的價值，進而呼應政治、社會文化經驗、行為和需求（李紅濤、韓婕，2020）。因而在這種強烈的煽情敘事中，不僅能讓讀者為之感動，同時也為群眾樹立了一個抗疫英雄的標桿，進而鼓勵和動員社會群體在疫情當下以大局為重，以造福和奉獻社會為核心。在集體精神的倡導下，任何關心醫護人員醫療保障和患者人權的聲音都將被視為是給抗疫「添亂」，是而當香港傳出醫護人員罷工的資訊時，人們關注的並非醫護人員的權利問題，而更多的是在責備他們的自私。換句話說，個人在這樣的風險論述下變得微不足道，「犧牲」與「奉獻」讓人們自然地忽略了個體應當享有和爭取的權利，同時讓粗糙的防疫措施和草率的危機處理變得可以忍受。人們關心的不是如何在對抗不當的政策，而是如何在不當的政策下犧牲自我。

除卻塑造抗疫英雄的形象外，這一框架還包括呈現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幫助以及刻畫和諧的社會生活與環境。例如<眾籌！一人一句，說給武漢，說給中國！>、<等春來，我們好好擁抱>、<女護士眼鏡壞了，凌晨在武漢急得直哭！接下來發生的事讓人淚目>等文章，通過動員大眾給武漢加油，一定程度上轉移了疫情的嚴重性帶來的緊張氛圍。在傳統文化的觀點中，愛可以幫助大家度過難關，描繪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扶持則是向人傳遞出中華民族是一個有愛的民族，只要萬眾一心就一定能克服困難戰勝病毒，通過這樣的方式能夠堅定大家的信心，增加民

眾對官方的支持。

這一框架還會通過描繪一些輕鬆愉快的場景來維護社會的穩定，降低公眾的不安，尤其是在 3 月 11 日之後，《人民日報》非常注重描繪病患之間的輕鬆場景和武漢正在復甦的景象，進而向讀者傳遞「病毒並未將中國擊垮，中國是很強大的國家」等信念。如<我在方艙醫院的一天>通過向公眾呈現方艙醫院中有秩序、有條理、輕鬆愉快的生活，變向地回應大家對方艙醫院這一集中收治病人措施的質疑。同時這種論述也通過把病情輕鬆化和娛樂化，轉移了公民的問責情緒，讓大家陷入和諧的想象，不再思考更進一步的問題。而<武漢最新航拍：雪過天晴>、<武漢的櫻花都開好了>等文章，則是一方面宣傳武漢美麗的景象，一方面是在告訴公眾抗疫勝利了，美好的生活又可以繼續了。「雪過天晴」說的既是武漢，也是藉此來隱喻整個中國都將從這場災難中走出來，告訴民眾國家仍在前進，國家仍然有能力。

（二）、科普與闢謠

科普與闢謠在 3 月 11 日前的文章中佔了 21.6%，與集體精神的框架相當。不過，在 3 月 11 日之後，這一框架則減少至了 1.5%。通過分析，科普與闢謠在新冠疫情爆發前期，為穩定民眾的情緒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一框架主要用於向公眾介紹陌生的風險，通過介紹其傳染機制而進一步告知公眾應當如何預防，同時對民間的謠言作出回應，幫助公眾掌握正確的對抗疫情的方式，配合國家的安排與指示。科普與闢謠產生的另一重要作用則是告誡和警示，如<一隻蝙蝠的自述在朋友圈火了：千萬不要再吃野味了！>、<@所有人，集聚就是添亂！>、<請保持 1 米以上距離！20 個安全出行的建議一定要看>，文章中對「務必」、「一定」、「不要」等詞彙的使用，傳達出事件的嚴重性和必要性，進而確保能夠引起公眾的注意和警惕。另一方面，以科普的形式向公眾提出告誡，則是將與科普內容相斥的行為安排進不科學的行列中，這樣不僅能夠警示公眾，同時也能動員群體進行自發的自我審查，共同對科普之外的行為加以斥責，正如當時發生在各地的反聚集、取消拜年等倡議一樣。

科普與闢謠的論述在一定程度上將定義何為科學的權力掌握在了官方媒體的手上，這不僅進一步鞏固了官方媒體的權威，還能幫助官方媒體對知識的選擇進行控制。例如在關於新冠肺炎是否會通過氣溶膠傳播的知識上，官方媒體曾親自闢謠後又承認，前後的轉變除卻是由科學的不確定性造成的混亂外，事實上也

說明了官方希望能盡量排除負面的資訊，穩定民眾的情緒。另一重要事例則是雙黃連口服液能夠治療新冠肺炎的謠言，官方媒體曾將其當做事實進行傳播，雖然其後媒體刪除了相關報道，但仍可以說明，在科普與闢謠的框架下，官方媒體雖然注重提高公眾的警惕，但更加關心謠言是否會造成社會的不安以及如何堅定民眾的信心，用科學的論述給民眾帶去抗疫的希望。

科普與闢謠的框架在 3 月 11 日之後則相對的減少了，由於 3 月 11 日後武漢的疫情有所緩和，同時公眾對病毒的了解也已經相當充分，因而官方面臨的問題不再是社會對未知風險的困惑和恐懼，而是轉向了別的問題。

（三）、違規批評與處罰

在 3 月 11 日前，違規批評與處罰的框架在風險論述中只佔據了 6.8%，而在 3 月 11 日之後又降低至了 2.2%。這一部分的內容，主要是對風險事件中的違規行為進行批評與指責，尤其是回應大眾的關切和質疑。然而，這種批評和處罰並非是以承認錯誤的方式呈現，而是以中央指責地方的口吻來呼應群眾的指責，要求地方政府做出改變。例如一篇名為<人民銳評每一筆捐贈財物都要用在刀刃上>的文章即是回應當時中國紅十字會對善款不透明不公開行為，以及民眾對紅十字會沒有將捐款合理地送至抗疫醫護人員手上的質疑。「武漢市漢口醫院的常樂醫生說，他之所以去倉庫，是因為有捐贈者向該醫院送去了 1 萬個 N95 口罩。但他說，當他到達時，口罩已被重定向到其他地方，取而代之的是紅會給他的一些不合標準的用品」（郝海威、黃瑞黎，2020）。在疫情之中，紅十字會的信譽再次受到打擊，而作為中國共產黨扶持、資助和掌管的政府部門，它的信譽危機將會影響到民眾對整個政党和體制的信任。因而《人民日報》在上述的這篇文章中對此作出回應：

從 83 歲拾荒大爺捐出萬元用於防疫，到貴州 60 名小學生拿出 12400 元壓歲錢，再到四川農民將自家種植的 10 萬多斤蔬菜捐出……一樁樁捐錢捐物的感人事蹟，讓人感受到充盈其中的大愛與責任。拿什麼回饋那一顆顆滾燙的愛心？……用好、用對、用清楚每一筆財物，才是對慈善負責。針對這個過程中公眾對受捐財物的種種疑問，也要及時回應，打消公眾的疑慮（秦川，2020）。

首先，文章先對社會群眾善良的捐贈行為作出了肯定。這一方面是在鼓勵和讚揚民眾的行為，同時宣稱應該認真地對待民眾的愛心，不能讓民眾失望。另一方面通過肯定的論述來宣稱官方媒體是和群眾站在一邊的，必然會為群眾的愛心討一個公道。然而，文章之後雖然提及應該讓財物及時回應和公開，卻沒有直接承認紅十字會有不公開的行為。表面上對不合理的行為進行了批評，但實際上卻通過把問題上升至抽象層面的公平、公正、公開，而逃避了對具體操作層面進行問責和整改。文中提到「一旦發現違紀違法行為，嚴懲不貸，絕不姑息」，然而違法行為有哪些？為何產生這些違規行為？如何整改？這些問題都不是文章想要提到的內容，文章希望通過「銳評」的方式向群眾表達中央的立場，亦即即便有任何違法行為，都是他們在違背中央領導的指示下進行的，中央政府仍然是一個可以信任，與群眾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同時，這一論述還會配合此框架下的另一部分內容，即對防疫過程中違規官員的罷免來展示官方抗疫的決心，同時消除民眾的憤怒，安撫民眾的情緒。但是這一切違規行為背後應該帶來的體制問題的省思通通沒有觸及，而也正是通過這樣的論述才進一步鞏固了中央的權威。

此以框架下另一個重要的內容即是對不遵守抗疫規定的群眾的批評。不過這種批評並非是直接明了的指責，而是通過描述違規群體在違規後的不幸遭遇來暗示不遵守防疫規定將會自食其果，同時也從另一個層面論證了中共防疫政策的正確性。如<她隱瞞病情，失去最佳治療機會去世>、<明知一起聚餐的親戚確診卻不當回事，一家 7 口全部中招>等，這些指責與批評也是對科普與闢謠框架下的告誡相呼應的，其作用在於能進一步加強民眾對官方政策的配合，以維護社會治安。而從這一框架在風險論述中所佔的比例也可得知，對於自身的批評與反省並非是官方媒體在風險論述中的主要內容，批評的過多反而容易暴露出體制的缺點，而適當的回應也能在某種程度上消解群眾的憤怒，歌頌在這些論述中明顯比批評更重要。

（四）、領導人指示與事跡

領導人指示與事跡在全部的風險論述中並不佔很大的比例，在 3 月 11 日前，其佔這一階段風險論述的 4.3%，而 3 月 11 日之後，其只佔了這一階段論述的 0.7%。不過，雖然只佔有很小的比例，這一框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雖然自毛澤東時代後，中國已不再搞個人崇拜的意識形態論述，然而國家領導人在民眾心中的形象和地位仍然是崇高和無法撼動的。新冠疫情爆發之後，習近平面臨

了前所未有的正當性危機，而能否在這場危機中重塑偉大的領導人形象，更關係著整個政黨能否繼續獲得民眾的信任。換句話說，國家領導人的偉大形象仍然關係著整個社會和政黨的穩定和安危。因而在這一階段，《人民日報》仍然會通過強調國家領導人正在指揮著這場抗疫鬥爭來強調其領導能力和權威，如<習近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習近平：務必高度重視對醫務人員的保護關心愛護>。在這些文章中，論述不斷強調習近平對疫情的防控提出了各式各樣的要求，包括「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完善應急醫療救助機制，在突發疫情等緊急情況時，確保醫療機構先救治、後收費，並完善醫保異地即時結算制度」。這些論述的要點在於向民眾強調中央正在全力以赴對抗疫情，並沒有鬆懈和懶政，藉此穩定民心，增強民眾的信任。而同時，該框架也是藉此論述將中央與地方進行了劃分，如果是違規批評與處罰是在對違規事件進行由中央向地方的問責，那麼領導人指示與事跡則是以中央向地方傳達指令的方式為違規行為劃定一個範圍，同時藉由這種切割削弱了地方政府的過失對中央造成的傷害和危機。

另一方面，這一框架還有展示國家領導人對群眾的鼓勵和問候，以塑造其親民的領導人形象，進而增加民眾的好感，減低問責和質疑。如<習近平考察火神山醫院>、<剛剛，習近平來到武漢這個社區！>、<感謝武漢人民！>，這些文章通過描繪習近平到武漢考察、關心地方百姓的事跡來突出其對民眾的關心，塑造其親民，為民服務的好領導人形象。同時也通過稱讚和感謝的方式來安撫受到疫情衝擊的民眾，緩解民眾因為風險而產生的悲傷、埋怨的情緒。這種鼓舞人心的方式同樣讓人們振作起來共同對抗風險，維護社會的和諧與太平。

二、國情論與中國特殊論

國情論與中國特殊論是為了強調中國當前實行的政府體制是最適合中國的，亦即西方所倡導的民主和選舉並不能幫中國走向民族的偉大復興。而換句話說，即西方的民主和對中國的指責不僅是對中國的不了解和抹黑，同時也會給他們自己的社會帶來危害。而在這樣的重大風險事件中，在西方媒體上幫助問責中國的群眾是對國家的背叛，是為了幫助西方國家阻礙中國的進步和復興。因而這一意識形態下所形成的論述框架包括了風險在國外蔓延和外國媒體抹黑中國。

（一）、風險在國外蔓延

這一框架在 3 月 11 日前風險尚未在國外大規模蔓延時只佔據了該階段風險論述的 1.9%，而 3 月 11 日之後則上升到了 14.1%。面對接踵而至的來自國際社會的指責，官方媒體嘗試將論述從自我的批評與反省，轉向呈現西方社會的混亂，藉此突出中國治理模式的優越性同時反駁西方國家的批評——正因為沒有吸取中國的經驗，為了抹黑中國而錯誤地指責中國的治理模式，才會造成當前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後果。在《人民日報》發佈的一條名為<新冠肺炎如何攻陷全世界>的視頻中，從傲慢、政治正確、賭博、貪婪和自私五個角度對新冠疫情在國外蔓延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視頻中的觀點認為，西方人面對病毒時的傲慢和不警惕、將不戴口罩視為對人權維護的政治正確的行為、不叫停公共活動的賭博式抗疫、媒體為了博取眼球發佈抹黑中國的假新聞而導致正確的措施不被採納、出台出口禁令造成物資困乏是疫情在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通過這樣的論述，官方媒體向公眾傳達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和低效，同時也反面證明了中國在採取措施時的及時和高效的風險治理能力。把焦點轉移至對國外疫情的關注，尤其是通過國內外風險狀況的對比，突出了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更從某種程度上加強了民眾對早期政府遲緩應對的理解——畢竟西方國家在疫情肆虐之時也沒有能及時得採取有效的措施來防止病毒的蔓延，因而早期的錯誤判斷變成了可以理解的失誤。

同時對比在報告國內疫情狀況與國外疫情狀況的語氣使用時可以發現，在包括國內疫情時，官方媒體採用的標題是<湖北最新：新增確診 2345 例，新增死亡 64 例>，較少的語氣詞和簡潔的話語，傳遞出嚴肅緊迫的感覺。而在匯報國外疫情時，文章的標題則是<中國以外 87182 例，反超了！>、<最新：中國以外破 70 萬例>、<全球单日新增病例数首次超 10 万！美国累计确诊超 33 万>。這些標題通過使用「反超」、「破」、「超」等常用於競技中的表達，再加之以感歎號的使用，傳遞一種突破和超越的激動心情，更透露出西方國家抹黑中國後自食其果的幸災樂禍。與此同時，這些因為西方國家自身遲緩應對而造成的危機讓他們認為中國讓病毒擴散的指責沒有了說服力，這一論述也未嘗不可看做是官方媒體對來自國際社會指責的有效回應和澄清，以此來撇清自己的責任。這些論述雖然沒有正面回應批評，並為早期的錯誤致歉，但足以使公眾重新信任國家，原諒錯誤的政策。

（二）、外國媒體抹黑中國

此一框架直接對國外媒體的指責進行了部分的選擇性回應，強化了西方媒體無理取鬧的形象，進而進一步論證中國政體是符合國情的、優越的。不過這一框

架在所有論述中並不佔很大的比例，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前，這一框架在所有論述中只佔 1.9%，而 3 月 11 日之後雖然上升，也仍然保持在 3.7% 左右。但這種選擇性的回應仍然重要，因為它有助於將中國塑造成因正在崛起而受到了西方社會打壓的弱勢國家，進而增強社會的凝聚力而一致對外，強化民眾的愛國主義情懷。而之所以說是有選擇的，是因其主要是對西方媒體中流行的病毒起源陰謀論等並無科學依據的論據進行回應，能夠強化其惡意抹黑的事實；而面對類似體制問題和官僚主義的問責則選擇忽略，反而是用某一項無理的指責來否認其一切的問責，因國外媒體的目的是抹黑中國，所以在任何的報道下都帶有惡意的目的，因而全都不可取。

在〈新冠病毒是美軍帶到武漢？外交部表態〉的文章中，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稱：

個別美國政府高官和國會議員借此發表種種不實和不負責任的言論，抹黑攻擊中國，我們對此堅決反對。事實上，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國內，對病毒源頭問題有不同看法。中方始終認為，這是一個科學問題，需要聽取科學和專業的意見。

在這段回應中，中方將美國的質疑稱為是「不實」、「不負責任」和「不科學」的，也認為美國媒體的許多報道帶有惡意攻擊的企圖，因而在這樣的定性之下，官方媒體隨後報道了取消美國駐京媒體記者證的措施則能夠被民眾輕鬆地接受。在文章〈不接受！不歡迎！〉中，媒體報道了中方記者在美國遭到驅逐的遭遇，稱其對中國進行不斷升級的政治打壓和歧視。在宣稱言論自由的美國卻禁止中國記者的採訪權和報道權，這篇文章反而通過論證美國的表裡不一，合理化中方的行為和措施，更因民族之間的對立，將民眾的憤恨之情從疫情中的疏忽轉向了國外媒體的「趁火打劫」，進一步增強了民眾的支持度。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民眾對自立自強的渴望和曾被殖民的屈辱感讓他們能團結在一起應對其他民族的攻擊。而外國媒體抹黑中國的論述框架則有效地喚起了民眾心中的民族對立情緒，使之團結在一起擁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定。

三、復興論

在復興論的意識形態下，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和富強當中的國家。為了維護

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政府需要通過經濟增長、公共福利等措施來提高執政的績效，進而換取民眾的支持和信任。這一部分的風險論述框架包括了國內風險時況匯報、國家能力與效率以及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一）、國內風險時況匯報

這一框架在疫情全球大流行前後都佔據著風險論述最大的比例，在 3 月 11 日前，有 26.5%的文章都是關於國內風險時況匯報的內容，而 3 月 11 日之後，該內容仍然佔有 29.6%的比例。而之所以將之歸為復興論的意識形態，正是因為在風險事件中及時得向公眾匯報最新的狀況，解決公眾的困惑和擔憂是國家執政過程中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而此前，中共也因為有意弱化疫情嚴重性的論述，引發公眾對確診人數不公開和隱瞞疫情的質疑和指責。因此及時止損，將確診人數透明化成為官方媒體必須採取的行動。除卻報告確診人數之外，該框架中還涵蓋了對密切接觸者的追蹤、醫療物資的征集和疫情相關政策的通知等內容，其目的在於為公眾提供一個了解疫情的管道，成為公眾獲取最新資訊的窗口，進而將官方媒體打造成為為人民服務的資訊平台。

不過，即便都屬於同一個框架，在 3 月 11 日前的論述與 3 月 11 日之後的論述仍有些微的差別。3 月 11 日前，官方媒體一方面要肩負起提高民眾警惕的責任，因而在疫情的匯報上必須凸顯其嚴重性和事件的嚴肅性；但是另一方面，官方媒體也要防止疫情的嚴重性會造成民眾的不安和社會緊張的氛圍，甚至可能增加民眾對官方的抱怨和指責，因而在匯報的同時還要加入抗疫成果的展示，並向公眾傳達出希望。例如，〈緊急擴散！急尋 22 日 K1068 次 4 號車廂乘客！〉、〈不止武漢！湖北多地急需防疫物資捐助〉、〈最新！全國新增確診 3235 例，累計確診 20438 例〉這些文章，意在向公眾傳達疫情的急迫性，呼籲公眾能進行自我管理，居家檢疫，同時號召群眾進行社會捐贈和支援，鼓舞大家一起抗擊疫情。而同時，官方媒體也會發佈抗疫中的小成果來鼓舞人心，讓人們不至於陷入風險造成的絕望中。如〈疫情防控關鍵階段，10 個好消息來了！〉就報告了 12552 治愈出院的案例以及確診人數正在逐日減少的訊息，意在告訴公眾疫情防控已漸趨平穩，不用太過擔憂和失望。而〈這個「交會」，讓人欣喜！沖啊，小藍線！〉一文中，則是向公眾報告了治愈出院病例首次超過新增確診病例的訊息，通過繪製折線圖的方式，清楚地呈現了確診人數將要減少的趨勢，更意味著這場抗疫戰爭即將要引來曙光。

而 3 月 11 日後，雖然疫情確實有所好轉，武漢也即將解封，但是新冠病毒卻沒有徹底地被清除，仍然不時地在各地爆發。因而，官方媒體一方面要加強政府抗疫成功的勝利敘事，一方面還是要提醒民眾不能放鬆，以免因太過樂觀而造成悲劇重演，這就造成了如<清零！清零！>、<0！0！0！終於>等呈現疫情已經好轉，抗疫已經完成的「好消息」與<47!474!嚴防別大意！>、<38+1+78，別鬆勁！>等警示與告誡的「壞消息」一直交替出現的現象。與此同時，這些實時的資訊也會配合「何時開學」、「何時高考」等政策發佈來進行社會秩序的維護和安排，以穩定民心和提高民眾的配合度。

（二）、國家能力與效率

國家能力與效率也是有關新冠疫情的風險論述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在 3 月 11 日前，這一框架在風險論述中佔了 13%，而 3 月 11 日之後則佔了 9.6%，從比例上來看前後差異並不明顯。而這一框架的主要內容則是以更為直接的方式向公眾傳遞政府具有治理危機的能力，且能夠幫助民眾度過難關。作為復興論的一部分，這一論述框架旨在向民眾傳達日益增強的國家執政能力、行動能力、科研能力和公共福利制度。

不過 3 月 11 日前後略有不同的地方在於，3 月 11 日前，官方媒體重在強調黨員，即代表執政黨的人群義無反顧地為民眾奉獻自我的精神和行動。與此同時也注重強調官方抗疫團隊的能力和效率。如<一線崗位全部換上黨員，沒有討價還價！>即向民眾傳遞了黨員的勇氣和為民服務的決心，而<剛懷疑自己染上新冠肺炎，「騙子」的電話就打過來了！>則是講述國家流行病學調查員快速的工作效率，能及時地通知新冠病毒的密切接觸者，為民眾提供安全的保障，與此相似的還包括武漢搶建方艙醫院等體現國家在疫情面前的決斷的文章。另一方面，媒體還會通過<互喊加油，四大天團會師武漢！網友：王炸來了，中國必勝！>的論述，將中國的醫療團隊描述成「天團」和撲克遊戲中的「王炸」來凸顯官方團隊的出色，進而增強民眾的自信心。

而 3 月 11 日之後，媒體在宣傳國家能力與效率方面則偏向了為曾在抗疫過程中付出辛勞的醫護人員提供保障，以體現國家福利政策的優越性和對人權的關懷和重視。如<兌現承諾的火鍋來了！援鄂醫護持證可免費吃一年>、<7000 勇士！51 架包機！回家了！>表達的都是對醫護人員的稱讚和關懷，而這一論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回應集體精神與和諧社會的框架，在塑造抗疫英雄的同時，也能給予

英雄以一定程度的回饋，因而更能起到號召和動員的作用。

（三）、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在風險論述中，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是一個不可忽略的框架。自疫情蔓延至全球後，中國不斷地受到來自國際社會的指責，而問題往往指向其在最初發現病毒的階段隱瞞疫情而造成肺炎的擴散，尤其以美國為主要的責難方，如川普把新冠肺炎稱為「中國肺炎」。然而，在復興論的意識形態指導下，中國應是一個正逐漸成長為富有社會責任感的大國，因而其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正不斷攀升，且擔當重要的角色。因此，自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後，官方媒體必須採取論述來維護中國的大國形象，並將其從病毒起源和政策失誤的責難中拯救出來。這也正是為何 3 月 11 日前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只佔所有論述的 1.2%，而在 3 月 11 日之後上升指了 11.9%。

在這一論述框架下，官方媒體意在營造中國在抗疫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樂於與世界各國分享，幫助他們度過困境。這一部分的內容包括了<飛越 9619 公里，中國專家組抵達義大利！機長廣播好暖心...>、<支持塞爾維亞，出發！>、<中國展示了什麼是患難之交>等文章，通過宣揚中國為其他國家提供醫療物資以及派遣專家團隊前去指導他國進行疫情的防控，官方媒體重新梳理了中國有愛、無私、強大的國家形象，更是幫助中國跳脫出國外媒體的指責，將批評中國的國家劃定為惡意攻擊和抹黑中國的陣列。與此同時，由於中國在疫情爆發初期，許多國外留學生在海外徵集口罩運回中國而遭到部分媒體的抨擊，稱其搶奪其他國家的醫療物資，造成其他國家口罩的匱乏。因而官方媒體通過<十倍奉還！>、<3860000000 只！>、<中國工廠正在為世界夜以繼日生產呼吸機>等文章，展現中國正以大於過去他國捐贈十倍的物資來回饋世界，凸顯其大國責任和知恩圖報的優良品格。而<90 後護士在義大利上頭條...外國網友四字留言刷屏！>、<發佈會上，這個總統 3 次感謝中國>等文章肯定想民眾刻畫了一個受到國際社會肯定的中國政府，進一步論證了中國政策的正確性和優越性。同時也意味著雖然中國經歷了重大的風險事件，但是這一事件並沒有將其擊垮，它仍然在走向復興的道路上。

通過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的描繪以及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肯定和稱讚，官方媒體成功地抵消了外媒指責給中國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也是以部分國家糟糕的疫情

管控來凸顯中國政策的高效，在看似「將功抵罪」的論述下幫助中共避開了對體制的反思，並不斷地鞏固其權威和領導，讓民眾更加信任和支持。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對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在新冠疫情期間的相關公眾號文章進行了分析，抽取從官方媒體承認肺炎能夠人傳人的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武漢解禁的 4 月 8 日期間的部分文章，從中總結出了中國媒體在風險事件中的論述框架，以及這些框架如何與官方的意識形態相互連結，進而在危機中重塑和鞏固政權的正當性，獲得民眾的支持。本研究在分析了 297 篇新冠疫情的相關文章，並以 3 月 11 日為分界點進行對比後得出了九種風險論述的框架，分別為集體精神與和諧社會、科普與闢謠、違規批評與處罰、領導人指示與事跡、國內風險時況匯報、國家能力與效率、中國對世界的貢獻、風險在國外蔓延以及外國媒體抹黑中國。

與此同時，本文結合曾敬涵提出的中國政權正當性維護的三種非正式意識形態對框架進行了分類，揭示了在穩定論的指引下，官方媒體通過倡導集體精神和描繪社會的和諧來幫助民眾從風險的緊張情緒中抽離出來，重塑對抗疫的信心；同時官方媒體還會實時跟進社會熱點，對不利於社會安定的謠言進行闢謠，並及時得向民眾進行科普，幫助民眾更加了解新冠病毒，消除民眾心中的恐懼和困惑；除此之外，針對疫情期間爆發的民眾的指責和政府官員的執政錯誤，官方媒體會通過批評和處罰的方式將地方與中央切割開來，藉此向公眾表明抗疫的決心，並減輕由地方政府的錯誤造成的中央政府的信任危機；緊接著，官方媒體會通過報告領導人的指示與事跡來向公眾塑造一個親民的、關切百姓的領導人形象，增加民眾對領導人的好感，進而獲得民眾的支持。

而在國情論和中國特殊論意識形態的指引下，官方媒體通過向公眾展示風險在國外的嚴重性來突出中國政體的抗疫政策的優越性。同時也間接地論證了西方國家的民主選舉等制度並不適合中國，不能夠幫中國從風險事件中走出來。此外，在 3 月 11 日疫情蔓延至全球後，中國不斷地遭受到國際社會的指責，為了重塑其大國形象和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和政策的正確性，官方媒體必須對國外媒體的指責作出回應。而在回應的過程中，官方將外國媒體塑造成惡意抹黑中國，有意阻止中國發展的負面形象，進而激發起民眾的愛國主義情懷，增強了社會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官方媒體還受到復興論的意識形態的指引，通過及時得向公眾匯報疫情的狀況回應公眾對其不公開不透明的指責，並通過成為民眾獲取最新資訊

的官方渠道來重新樹立其權威性和領導地位。此外，官方媒體還要通過強調國家抗疫的能力和效率來提高民眾的支持和信心，包括為公眾解決就業難題、提供醫療保障以及為醫護人員提供抗疫獎賞等方式來提高公共福利，進而提高公眾的滿意度。而 3 月 11 日之後，由於疫情在國外爆發，官方媒體更加通過呈現中國對世界的回饋和貢獻來展示中的無私和大愛，同時迴避中國沒有控制好疫情而造成世界混亂的指責，且更進一步地增強民眾的自豪感和對國家的支持。

本研究借用正當性理論對中國官方媒體的風險論述進行分析，意圖呈現中共何以能在風險事件中依然獲得民眾大量的支持。不過，民眾作為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個體，究竟在大多程度上會受到媒體框架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的分析。而同時，除卻官方媒體之外，是否還存在其他的民間媒體與其對話，而這些媒體在塑造風險事件的論述過程中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此外，除了媒體報道的內容，在風險事件中有哪些是媒體沒有報道的內容？這些內容在國外媒體和社群媒體上又是如何傳播並影響著官方的論述的？這些問題都仍待未來的研究加以回答。

陸、參考文獻

趙鼎新（2018）。《正當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曾敬涵（2016）。《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意識形態、正當性與凝聚力》。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張文靜、杜軍（2010b）。〈民族主義與多民族國家的政治正當性〉。《廣西民族研究》1 期，1-5 頁。

周本順（2011）。〈防止落入所謂公民社會陷阱〉。《求是》，5 月 17 日。

王星閏（2010 年 11 月 25 日）。〈實現「強國」和「富民」的有機統一〉，《人民日報》。取自 http://views.ce.cn/main/qy/201011/25/t20101125_21995737.shtml。

王義桅（2013 年 1 月 11 日）。〈中國模式正在打破「普世價值」霸權〉，《人民日報》。取自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3/0111/c1001-20166349-2.html>。

倪光輝（2013 年 8 月 21 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努力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報》。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821/c64094-22636876.html>。

- 石平 (2013)。〈警惕網路「負能量」〉。《求是》，13 期，46-47 頁。
- 儲百亮 (2020 年 5 月 21 日)。〈疫情危機中，習近平成功重寫政治敘事〉，《紐約時報》。取自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0521/coronavirus-china-xi-jinping/>
- 儲百亮 (2020 年 12 月 14 日)。〈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世界：中國崛起，西方衰落〉，《紐約時報》。取自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1214/china-nationalists-covid/>
- 儲百亮 (2020 年 12 月 30 日)。〈改變世界的 25 天：新冠疫情是如何在中國失控的？〉，《紐約時報》。取自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1230/china-coronavirus/>
- 馬曉華 (2020 年 01 月 21 日)。〈從未見明顯人傳人到人傳人，復盤武漢疫情二十天〉，《第一財經》。取自 <https://www.yicai.com/news/100476157.html>
- 秦川 (，2020 年 1 月 30 日)。〈人民銳評 | 每一筆捐贈財物都要用在刀刃上〉，《人民日報》。取自 <https://mp.weixin.qq.com/s/ikwk9U4RDtdICFLME5yw6A>
- 郝海威 (2020 年 1 月 11 日)。〈武漢封城臨近週年，中共力推抗疫勝利敘事〉，《紐約時報》。取自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10111/wuhan-china-coronavirus/>
- 郝海威、黃瑞黎 (2020 年 4 月 28 日)。〈政治、醜聞與野心：“新冠病毒外交”中的中國紅會〉，《紐約時報》。取自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0428/virus-china-redcross/>
- 袁莉 (2020 年 2 月 27 日)。〈中國宣傳機器在新冠疫情中受挫〉，《紐約時報》。見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0227/china-coronavirus-propaganda/>
- 李衛紅、姜潔 (2015 年 9 月 10 日)。〈王岐山會見出席「2015 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外方代表〉，《人民日報》。見 <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5/0910/c64094-27565064.html>
- 李紅濤、韓婕 (2020)。〈新冠中的非典往事：歷史類比、記憶加冕與瘟疫想象〉，《新聞記者》，2020 (10)：15-31。
- Bondes, M. & Heep, S. (2013). Conceptual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uasion and Legitimacy: Official Framing in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8(4), pp. 317-334.

- Brady, A.-M. (2009). Mass Persuasion as a Means of Legitimation and China's Popular Authoritarianis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3(3), pp. 434-457.
- Cai, Y. (2008). "Power Structure and Regime Resilie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 pp.411-432.
- Cong, X. (2013). "Road to Revival: A New Move in the Making of Legitimacy for the Ruling Party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3), pp. 905-922.
- Gilley, B. & Holbig, H. (2010). "Reclaiming Legitimacy in China." *Politics & Policy*, 38(3), pp. 395-422.
- Holbig, H. (2011).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Legitimacy: Reflections on Western Theories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2), pp. 161-181.
- Kusin, V.V. (1978). From Dubcek to Charter 77: a study of "normalization" in Czechoslovakia, 1968-197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 pp. 326-343.
- Schull, J. (1992). "what is Ideology? Theoretical Problems and Lesson from Soviet-Type Societies." *Political Studies*, 40(4), pp. 728-741.
- Tong, Y. (2011). "Morality, Benevolence, and Responsibility: Regime Legitimacy in China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2), pp.141-159.
- Wang, Z. (2010). Generational Shift and Its Impacts on Regime Legitimacy in China. China Polic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 Xiao, Y. (2013). "The Politics of Crisis Management Chin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arwick.